

论郑观应的现实主义思想

李政阳

〔摘要〕 19世纪60年代后期,郑观应开始对中外关系和维新变革等重大问题进行长期、系统、深刻的思考,并针对自强、权力和均势等关键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形成了系统的现实主义思想。郑观应现实主义思想的关键是自强,强调学堂为先、人才为本,认为只有外争权力、推行均势才能自保。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郑观应的现实主义思想反映出他对时局较为理性的认识,亦是其维新变法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郑观应现实主义思想进行全面考察,为我们深入探讨近代以来时代先进如何应对民族存亡困局提供一个个案和新的视角。

〔关键词〕 郑观应;现实主义;权力;自强;均势

〔中图分类号〕 K2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25)01-0144-09

〔作者简介〕 李政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党史党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451464

现实主义是西方国际体系中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和利益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其实质是一种基于国家力量的权力关系。尤其是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在现实主义思想看来,斗争和冲突是基本特征,且只能以“权力”和“利益”为轴心,与理想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理念截然不同。正是由于现实主义强调权力、利益和国家安全,所以在面临巨大外部压力的晚清时期,一部分试图以变革挽救民族危亡的有识之士的思想主张,不约而同地与西方现实主义思想中的一些观念、看法产生了关联,甚至有相通相似之处。作为晚清重要的维新改革思想家,郑观应围绕富国强兵提出的一系列主张暗合了西方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的部分核心理论,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面对不断加剧的内忧外患,洋务运动兴起。这段时期,随着郑观应转任太古轮船总买办,其经济地位迅速提升,辅以赈务、政论,使他在上海滩名声渐起,并成为在沪香山买办的代表人物之一。也就是在这段时期,郑观应开始深入思考中国的前途命运以及中国如何与列强相处等宏大命题,相继出版《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著作,并逐渐形成以自强、权力和均势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思想,为他日后形成完整的维新变法思想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郑观应认为,国际社会的“公法”是“虚理”,只有自强才有资格谈“公法”,所以他强调中国“唯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①此外,郑观应论证了权力是决定国家生存和利益的核心要素,指出“弱肉强食心理无,唯有权力为英武”,^②认为中国应加强经济和军事力量。除了权力,郑观应亦将均势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特别是甲午前后,郑观应的“抗日”和“联日”主张是其均势思想的具体体现,反映其出于国际形势和国家利益进而改变“抗”“联”主体的倾向。

关于郑观应的现实主义思想研究,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不少论者从郑氏诗歌角度,系统揭示郑观应部分诗作的现实主义思想。^③刘然玲对郑观应的国家理念及意识进行探析,认为郑观应是一

① 郑观应:《公法》,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67页。

② 郑观应:《保主权》,夏东元编《郑观应集·救时揭要:外八种》,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59页。

③ 参见龚刚:《百年风华:20世纪中国文学备忘录》,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页;方志钦:《郑观应诗歌的爱国情怀》,《岭南文史》2002年第3期;龚刚:《心慕“神韵派” 诗多“杜陵篇”——论启蒙思想家郑观应的诗艺与诗观》,《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等,其他不再赘列。

位实业救国、注重发展的现实主义者。^① 钱寿根和王伟伟强调郑观应较早认识到边海防的意义。^② 陈峰论述了郑观应在 19 世纪 60 年代便开始以现实主义对待时局,并主张向西方学习。^③ 郝延平认为郑观应以现实主义应对西方冲击,强调郑氏重视议会制和工商业。^④ 夏东元强调郑氏的核心思想是“富强救国”,意图通过改革将中国从落后转为先进,认为“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是郑氏的思想核心。^⑤ 易惠莉提到,郑观应论述了战争与西方富强间的因果关系,郑氏解决了德与力、义与利的矛盾冲突,并基于历史和现实提出“世变无常,富强有道”的论点。^⑥ 此外,亦有学者从教育、军事、政治等角度对郑观应相关主张进行研究,这些成果大多限于郑氏富强救国思想体系框架,较少学者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研究郑观应的思想。由此可见,学界对郑观应现实主义思想的研究多置于情感、文化、制度等宏观叙述,尚未深刻阐述郑氏在思考中外关系以及中国命运时,所持现实主义思想的关怀与实质。鉴于此,本文尝试对郑观应的现实主义思想研究进行剖析,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一 自强可解中国之危机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即缺乏合法权威,因此国家需要采取自强战略来确保国家利益和生存。^⑦ 两次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使一些开明知识分子意识到向西方学习迫在眉睫,以“求强”“求富”为核心的洋务运动开启,其部分观念和思想认识亦契合了西方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思想的一些主张。1870 年前后,郑观应开始撰写《易言》,明确其写作目的为:“目击时艰,无可下手,而一言以蔽之曰:‘莫如自强为先’。”^⑧ 1874 年日本妄图侵略台湾,他在《易言》之《论边防》篇写道:“倘中国不能自强,将效尤而分西人之利藪”,^⑨ 并详述中国急需自强之处,认为“中国复奋发自强,则苞桑永固矣……夫控远为筹边之要,自强即不拔之基,因时制宜,有备无患”。^⑩ 1875 年,在《易言》之《论公法》篇中直言“世变无常,富强有道。……力行既久,成效自征”。^⑪ 1876 年,在《易言》之《论火车》中强调“唯自造而自用之,然后行止之权自我而操,工费之需不流于外,省之又省,精益求精。庶中国富强之转机在此一举矣”。^⑫ 此类自强论述在《易言》之《论水师》《论火器》《论机器》等篇章亦着重论及,足见当时郑观应对于自强的极力推崇。此后,郑观应又多次述及自强问题,并将实现自强的路径聚焦于人才、制造、制度等方面,其中特别的变化是他开始关注西方议会制等重大政治体制问题。1883 年,郑氏在《拟创设工艺书院机器厂节略》中认为“迨光绪初年大会,见俄国艺院新制机器,始师其法……所出学生俱能运用巧思,创造新器,精益求精,奇材日出,国家借以富强也”。^⑬ 1884 年,在《复香港大书院掌教霍见拿论中外时事书》中强调“(中国)拟仿西法设工艺并水陆军书院,教育人材,奏设海军,招商开矿,铸炮造船,创开铁路,或设议院,以冀有利必兴,有弊必除。诚能上下一心,实事求是,何虑中国不及泰西各国之富强乎”。^⑭ 经

① 刘然玲:《文明的博弈:16 至 19 世纪澳门文化长波段的历史考察》,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37 页。

② 钱寿根、王伟伟主编《国防法学》,解放军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42—143 页。

③ 陈峰:《中国宪政史研究纲要》,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1 页。

④ 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李荣昌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52 页。

⑤ 夏东元:《郑观应传》“前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 页。

⑥ 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22—124 页。

⑦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67—68 页。

⑧ 郑观应:《〈易言〉自序》,夏东元编《郑观应集·救时揭要》,第 63 页。

⑨ 郑观应:《论边防》,夏东元编《郑观应集·救时揭要:外八种》,第 116 页。

⑩ 郑观应:《论边防》,夏东元编《郑观应集·救时揭要:外八种》,第 118—119 页。

⑪ 郑观应:《论公法》,夏东元编《郑观应集·救时揭要:外八种》,第 66 页。

⑫ 郑观应:《论火车》,夏东元编《郑观应集·救时揭要:外八种》,第 82 页。

⑬ 郑观应:《拟创设工艺书院机器厂节略》,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编》,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219 页。

⑭ 郑观应:《复香港大书院掌教霍见拿论中外时事书》,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后编》,第 581 页。

历了1884年上海的经济风潮后,尤其是郑观应隐居澳门期间,他对于自强问题的思考更加聚焦且深入。1892年,在《盛世危言·自序》中言道“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①《盛世危言》一书中,《游历》篇认为“今之谈富强者,动曰军火宜备也,铁路宜开也,制造与工艺宜兴,矿产与商务宜振也”;^②《开矿》篇认为“历考泰西各国所由致富强者,得开矿之利耳”;^③《吏治》篇强调变法自强,《游历》篇论及上下一心是自强之基,《公法》篇认为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通使》《商务》篇谈到通使和商务在自强中的作用等等。

综合来看,郑观应认为,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实现:

(一)人材为本,学堂为先。郑观应认为国之兴衰系乎人才,^④近代英、德、法、美等国崛起与重视教育密切相关。上述四国让其国民从孩童始即入校学习,使国民有专师循循指导。专师所教自简至繁,故学生之智日积。泰西各国教育规制大略相同,学校划分成不同的等级,等级越高者,科目亦渐多。贫者,免出脩脯。无论贵贱,男女从小学堂始学地图、历史、数学、文理、物理和化学等。小学毕业后入中学堂。中学堂毕业后入专科学校,并由学生自行决定习武或者习文。专科毕业后,其愿再学者入大学堂去研习所好科目之奥义。西方各国的人才均是通过专家逐级选拔,从粗贱之事试之,期满功成后授之职。技艺学问讲究实事求是和实践之效。以至人材济济,国势以强也。^⑤

郑观应认为,与泰西各国相比,“中国师道日衰,教术日坏,无博学通儒克胜教习之任,无师范学校以养教习之才”,^⑥教师终身教五经与古文、从事章句之学,不通政治、历史、天文、地理等。因此中国文士专好八股文,不解西学,所专不能安国家。郑观应建议中国亟宜仿西方之教育制度,用以培养人才。此外郑观应亦详细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教育体系,并根据日本教育体系,提出具体改革意见,欲借此达自强之目的。其在《西学》篇中指出,“日本幼孩已得教训,与泰西不甚相悬”;^⑦在《盛世危言·学校》中也直言效仿日本教育体系,建立小学和中学等新式学堂以培育各类人才。^⑧对于具体措施,郑观应提议清政府可效仿日本设立文部大臣,并分派责任,强调应聘请中外专家选译有用书籍分发各省使用。

(二)各省、各府、各州、县俱设报馆。郑观应认为西方的强大与其发达的报刊业及其媒体监督作用关系紧密。郑观应观察到西方国家的报刊数量数以千计,西人无人不看报,老少皆知各国事务;报刊所论之事褒贬严格,不法之徒不敢为非作歹;西方报刊将议院决定、议员建议、外交事宜、国家政策、国内外商贸情况等皆登于报上,让国民了解国家各种情况;议会和报刊相辅相成,以国民共同的价值取向作为评判议员建议的标准;通过报刊选取有实才的议员,赏罚分明,人才辈出,竭其忠诚,国之兴也。因此,报刊也是国民参政议政、监督政府之有效途径。同时,报刊的实效性好于政府官书,也是官与民沟通的重要渠道。因报刊有助于自强,西方各国往往通过免除纸税来发展报业。^⑨

与西方报刊业相比,中国的报刊业仍处于萌芽阶段,最明显的莫过于中国通商口岸的报刊则均为西人主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媒体喉舌掌握在西人手中,因此每遇中外交涉之事,这些西人控制的媒体颠倒是非、造谣惑众,令中国在大众媒体中失声,不利影响明显。对此,郑观应建议由华人主笔在沿海各省建立报馆;凡是有助于自强之事务皆应及时见报,例如各国政事、兵制变迁、商务新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12页。

② 郑观应:《游历》,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159页。

③ 郑观应:《开矿上》,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473页。

④ 萧永宏:《王韬与郑观应交往论略——兼及王韬对郑观应思想之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⑤ 对于西方的教育制度,郑观应在《德国学校规制》《英、法、俄、美、日本学校规制》和《英、德、法、俄、美、日六国学校数目》等文中有详细论述。参见郑观应:《学校上》,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31—40页。

⑥ 郑观应:《学校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47页。

⑦ 郑观应:《西学》,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52页。

⑧ 参见郑观应:《学校上》,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46页。

⑨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的《日报上》和《日报下》篇中对日报的作用进行了详细论述。参见郑观应:《日报》,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122—128页。

法、官员过失、议员政策建议等;报刊主编应秉公无私,摆袖却金,若徇私舞弊、混淆是非则须严惩。此外,郑观应提出订立章程以保护报业,并给其一定自由权;先向沿海地区已有西式报刊学习,后创办由华人任主编的报刊,最终推广全国;在累积经验创立具有影响力的报刊后,中国在中外交涉中才会拥有更多话语权。^①

(三)建立以议院制为核心的君主立宪制。林则徐的《四洲志》、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汤震的《危言》以及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都在不同时期对议院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叙述。但在华夷之辨思想影响下,议院思想并未在社会引起波澜,直至19世纪60年代,中国设立总理衙门,一批出洋外交官关注到西方的议会制,议院思想才引起一定的关注。郑观应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效仿西方议会制,他于19世纪80年代开始讨论议院,撰写了《易言·论议政》与《盛世危言·议院》等篇目。郑观应主张推行议院制,认为议院制优于君主专制。在郑观应看来,君主专制使得社会只知利己不知爱国,致使国家日益积弱。实行议院制后,民众通过议院行使权力,议会限制君主权力,民主所求所需被充分尊重。议院制符合“民贵君轻”的传统观念,秦国推行的君主专制使得国人日渐忘记“三代之制”,在郑观应看来,议院制其实是“三代之遗风”,推行议院制不过是恢复中国古代的民主政治而已。郑观应肯定议院的作用,认为日本及西方强大之原因不仅在于坚船利炮,更在于议院。若只追求军事力量,忽视议院,则难以实现富强。^②

值得注意的是,郑观应所倡导的是调和式的君主立宪下的议院制,主张“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③其所设想的议院制偏向君权,“凡事虽有上、下院议定,仍奏其君裁夺;君谓然,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④有其时代和思想局限。

二 国家权力决定国家利益

作为认识国家行为的核心概念,权力被定义为国家所拥有的各种实力的总和。^⑤对于权力,郑观应指出,“夫各国之权利(力)……皆其所自有,他人不得侵夺”,^⑥郑观应认为国与国在订立合作意向时,表面本着互利的原则,实则权力决定利益。两国权力相当,则利益相配;若强弱相遇,则强者为尊。他指出:“唯强与强遇,则熟审两国所获之利益足以相当,而后允准,否则不从。若一强一弱,则利必归强,而害则归弱。”^⑦“弱者事事循理,迫于势也;强者事事挟势,恃其力也。……各国皆怀幸灾乐祸之心,冀邻国之弱,而不愿其强,以弱则易就范围,而强则难争利便……诚如春秋之世将变为战国仅存强大者而已”,^⑧“古今诸国莫不弱肉强食、虎视鲸吞”。^⑨郑观应从强与弱入手,解析国际体系规则,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认为决定国家生存和利益的核心因素是权力,其所论之权力涵盖电报、借债、矿产、铁路、税则、纺织、邮政等,而以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实力则为维护国家权力之重要后盾。

① 参见郑观应:《日报上》,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122—125页。

② 郑观应早期的议院思想主要体现在《易言·论议政》中,后在《盛世危言·议院》上下篇中进行了详细论述。参见郑观应:《论议政》,夏东元编《郑观应集·救时揭要:外八种》,第105—106页;郑观应:《议院》,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88—104页。

③ 郑观应:《议院下(甲午后续)》,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93页。

④ 郑观应:《议院上》,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91页。

⑤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页。

⑥ 郑观应:《公法》,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165页。

⑦ 郑观应:《条约(甲午后续)》,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213页。

⑧ 郑观应:《边防八》,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597页。

⑨ 郑观应:《弭兵》,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696页。

(一) 国家必须以军事力量做后盾

“各国莫不讲求武备,诈力相角……可见理绌于势,则公法亦不可恃。”^①郑观应认为各个国家都在极力发展军备,各国之间欺诈和暴力盛行,在此国际环境下国际公法是无力的。对于甲午战败,郑观应认为原因在于:中国重文轻武,不重视和平时培养精兵良将;将帅专业技能素养欠佳,不谙兵法,无勇无谋;军队奖惩制度不完善,因赏金过低侦察兵未能尽职,战中未增加士兵口粮,更有甚者作战胜利后不加奖励;军纪不严明,将帅不战前督战,作战士兵贪生怕死、望风而逃;各军营一盘散沙,军营名目众多,每遇敌人各自为营、苟且偷生;兵与将、将与帅之间拉帮结派、离心离德、水火不容,将领克扣下属军饷;面对漫长的边防和海防线,边防战略不清晰。^②

反观西方国家,其拥有选拔军事人才的科学体系,与中国的兵制差别巨大。预备武官需要先入学堂学习数学、兵志、兵法、外语等知识以提高素质,考试选拔优秀之人才再入军事学院学习,之后到部队实操训练,久经沙场考验后方能当选将帅。西方社会以入伍为荣,士兵退伍后仍享有一半军饷保障其生活,解决其后顾之忧。鉴于此,郑观应主张“朝廷亟宜讲求认真仿办,以御外侮”,^③建议仿照西式制度建立科学的军事体系。一是,各省依据自己的自然环境条件建立相应军事学院,聘请兵法、地理、历史等专业教师任教,从军事知识和实战演习两个维度考核预备武官。二是,学堂应按将帅、中级军官和士兵三个等级培养人才,按其岗位教授不同技能。三是,学院应重视训练士兵的力量,严明军纪,培养团队荣誉和精神。四是,军事学校应教授耕田、木工、挖掘等技术,借此帮助军队广开财源、减少开支。五是,划分海区加强海防,各海区相互配合、互通有无,以解决中国海岸线长、难守易攻的问题。六是,加强军事基础建设,在战略要地建设炮台、堡垒和水雷等防御设施。此外,根据实战需要改进武器设备和作战方案,铁甲船虽防御力强,但吃水深、行驶缓慢,应与改进后的蚊子船、快砵船相配合进行作战。七是,建立军事演习制度,各军种按其特点依据实战要求按期进行军事演习,演习过程中强调配合与合作。八是,将领务必知己知彼,熟悉敌我之人、马、财务、地势、常用战术、兵器杀伤范围等。最后,奖罚分明,提高士兵军饷以及战伤、战亡士兵的抚恤金。^④“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⑤郑观应强调加强军事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化解中国的危机。1873年《救时揭要》刊行,郑观应在《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中认为“诚如是,整顿军威以保社稷,复取西洋各国之兵法裕国足民,成充国用,而富强之道不亦伟哉!因势利导,转弱为强,愿天下有心人,研思而深体之”^⑥。

(二) 商务经济是国家兴旺安定的根基

“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舒畅其血脉也。”^⑦“各国并兼,各图利己,借商以强国。……凡致力于商务者,在所必争。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夫用出于税,而税出于商,苟无商何有税?……苟不留心商务,设法维持,他日必致税商交困而后已。……斯历代之所由衰乱也。”^⑧“非富不能图强,非强不能保富,富与强实相维系也。然富出于商……泰西各国以商富国,以兵卫商。”^⑨在郑观应看来,先富才能图强,强才能卫富,强与富相辅相成,互相成就。

郑观应认为西人通过商业活动追求富强之术,其总结西人经验如下:设置商部大臣管理商业事务;任命驻外领事保护本国在外利益,并派军舰造势;政府定期考察物产丰欠、进出口和销售量等,

① 郑观应:《边防六(甲午后续)》,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575—576页。

② 郑观应:《边防八》,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591—592页。

③ 郑观应:《海防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537页。

④ 对于西式军事体系,郑观应在《易言》的《论边防》《论水师》和《论练兵》等篇,以及《盛世危言》的《海防》《边防》和《江防》等篇中均有论及,这里主要参考《海防下》。参见郑观应:《海防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542—545页。

⑤ 郑观应:《练兵上》,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628页。

⑥ 郑观应:《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夏东元编《郑观应集·救时揭要:外八种》,第57页。

⑦ 郑观应:《商务一》,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377页。

⑧ 郑观应:《商务三》,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385页。

⑨ 郑观应:《商战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369页。

实时动态了解本国的商业情况,出台相关政策保护本国利益。“欧洲各邦,以通商为大经”,^①郑观应认为欧洲各国之所以强盛,重商、通商、兴办商务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郑观应特别推崇德国和日本的商业政策。比如德国为解决税务繁多和劫匪掠夺引起的贸易折损问题,特别建立商会,借此订立条约、互通有无、互相保护,如遇盗贼和不公则齐心协力共抗劫匪和强权,又可合力上书政府取消不利之商务政策。商会使德国商务振兴,后西方各国效仿之以图富强。^②又如,明治维新后日本领悟到国富兵强之要在通商,因此讲究机器制造、种植、矿物等学,以趋通商之利、避其害。经郑观应梳理,日本振兴商务采取的政策措施大致为:派大臣游历各国,学其各种学问;仿照西方在国内设立商务部,帮助亏损企业;讲究机器、仿造各国洋货,出口国外;修改税收条款;营造商业氛围等。^③

郑观应认为,中国要保护国家利益,必须重视发展商务和推行商战,促进国家利益和商务相辅相成。对此,他主张:中国须仿照西方制定商律维护公正和保护经济,经营商务需到地方注册,并对外公布股东和股本信息,公司总办需熟识商务,员工要求人岗匹配,官员不得随意举荐公司所用之人;政府应依据公法行使中国定税之权,撤销厘金,增加关税,以扶植本国商机;开办机械、技术和自然科学等学堂以启发商智,罚虚伪之行、赏诚信之举,以达可持续之目的;开设银行增强商力,银行支持各行各业,以达流通之利;派遣领事、修改洋税以保商权,洋税关系到国家主权和利益,反对外国主权干涉。^④此外,政府还要极力讲究制造之术、翻译实用之书、传播国外先进技艺;探寻才子用于创立公司、制造机器、商务学堂和开采冶炼;鼓励保险等金融业务;物质或精神奖励商务精英等。^⑤

关于商战,郑观应提出要以丝和茶等优势产业为先导,给予优惠政策,大力扶植发展,继而发展其他行业以深入推行商战。当然,郑观应也认识到人才和教育对商务的影响,主张中国亟宜仿西方之教育制度培养人才,由浅入深之法设立人才培养计划,奖励并录用回国效力之人才,并设立工艺院教授机器制造、织布、化学等科目。郑观应的商战思想涉及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多个国家,认为列强入侵中国的根本目的和最大危害在于经济。因此,郑观应主张推行商战进行反击,并且论证了国家利益与商战的关系。在运用商战思想的同时,郑观应强调中国应大修政令、变法自强,以增强内生动力。总的来说,郑观应推行商战思想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其主张博采各国商务之亮点,聚焦企业管理、政策支持、产业先导、人才培养、先进工艺、金融保险等重点环节,兼具实操性和灵活性,与当时中国朝野上下振兴经济以图自强的浓厚氛围颇为契合。

郑观应之国家权力思想随着时代发展经历了“重兵战”到“重商战”之过程,这与洋务运动初期,“求强”到“求富”步调几乎一致。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习兵战不如习商战”观念得到强化,洋务派开始筹办招商局、矿务局、机器织布局等为军工业提供资金支持。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清政府开始利用私人资本发展工商业,社会出现“官督商办”的经济形式。在此情形下,郑观应发表《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论述其观点。郑观应认为官办企业花费巨大,且成效甚微,故反对“官督商办”,支持“商造”。值得注意的是,郑观应基于西方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及其商业经验提出反对官办企业,认为以官僚权威为核心的官办经济体制违背经济规律,市场经营模式应以经济法则、专利制度、人才激励机制等为核心。

19世纪60年代,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国力迅速提升,日本的成功引起郑观应的关注,他注意到“年来日本机器织厂日增,所织各种棉布运入中国销售者亦日见其夥”。^⑥在给李鸿章的信中郑观应介绍日本已用机器织布,^⑦注意到日本纺织业在工业化加持下产量和出口量成倍增加,“将来日本在

① 郑观应:《论商务》,夏东元编《郑观应集·救时揭要:外八种》,第74页。

② 参见郑观应:《商务一》,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378页。

③ 参见郑观应:《商务二》,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382页。

④ 邱彦莉:《略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⑤ 参见郑观应:《商务五》,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397—404页。

⑥ 郑观应:《纺织》,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487页。

⑦ 夏东元编著《郑观应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113页。

内地通商,势必广制机器,华人所不知为而不能为,所欲为而未及为者,恐日人先我而为之。则外洋之利权既为欧西所夺,而内地之利权又将为日本所夺矣!现在风气之速,甚于迅雷,若不急思筹办,则日本创之,各国效之,华商必至坐困,无利可图,可不惧哉”。^① 郑观应呼吁中国效仿日本,重视商业,实行商战。此外,郑观应还详细介绍了日本重商和卫商措施,涉及效仿西方重订税则,他国较本国税重;将各国通商范围限制在外埠;本国人验收来往货物;关税机构人员皆为本国人;通商诉讼案件由本国官员审判;设立本国商务局及联盟以团结阻止不公之交易等。^②

与兵战相较,身处商界的郑观应更强调也更擅长商战,强调商业是国家富强的支柱,图存、自强、致富、工商之间须相辅相成。数年外商交往和竞争经验使得郑观应认识到商战对于保护提高国家权力的重要性,洋行的经验更是使得郑观应洞悉了外商进行商战,尤其是商业竞争与谈判的方法与技巧,他在招商局时期同太古和怡和所签订的“齐价合同”^③与相关合法竞争协议足以证明郑氏商战思想的实践性。

三 均势是基于中国落后现状的最优选项

现实主义不仅强调权力,亦重视将均势作为国家安全的支柱。^④ 鸦片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更是日益严重,西方列强侵略日盛,国际社会虽有公法,但“所谓势均力敌,而后和约可恃,私约可订,公法可言也”,^⑤“势强则理亦强,势弱则理亦弱,势均力敌方可以言理、言公法”,^⑥郑观应领悟到“公法仍凭虚理,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弱者必不免隐忍受屈也”。^⑦ 面对强国,公法无力,但各国主权不可侵犯则是公理,所以郑观应特别强调并重视均势,从而产生了浓厚的均势思想与倾向,指出“良以性法中决无可以夺人与甘为人夺之理,故有均势之法,有互相保护之法”。^⑧ 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来看,均势是用以防止霸权产生或者弱国自保的一种对外政策或者机制,均势手段也的确在个别弱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可能,郑观应以日本作为其均势思想实践的核心国家。日本与中国相邻,中日关系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郑观应关于日本的均势思想涉及朝鲜、俄罗斯、英、德、美、法、荷等多个国家,且随历史进展呈动态发展趋势。郑观应关于日本的均势思想,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甲午战争前之“抗日”,甲午战争后“抗日”与“联日”共生之双重面相,八国联军侵华后之“联日”主张。关于“抗日”,在甲午之前郑观应认为应牢牢控制朝鲜,从而稳定东北局面。他认为朝鲜与东三省相连,并且世代与中国和平共处,不侵不叛;朝鲜自然资源丰富,但国小且弱,郑观应认为日本对朝鲜图谋已久,中国必须保朝鲜以图稳定东北。^⑨ 除了日本,俄国亦伺机攫取朝鲜。故郑观应在 1891 年指出:“独力当俄、日之狡谋,不如合力以制俄、日之锋锐,此连横之策不可不讲也。……结英吉利同心合力以拒俄、日,中英联盟则与俄、日势均力敌。”^⑩ 郑观应认为俄国东进后会夺取英国在亚洲的利益,西进后更会威胁英国。对此,郑观应认为英国和中国拥有共同的战略需求,并提出中国与英国合力共同对抗日本和俄国的均势思想。

甲午战争后,郑观应认为各国有各自的战略需求,并采用均势思想以保护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谋求在中国的最大利益。如英国担心其商业利益受损因此不愿意中国被侵犯,德国担心俄国和法

① 郑观应:《商务五》,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 398—399 页。

② 参见郑观应:《商务二》,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 382 页。

③ 易惠莉:《郑观应评传》,第 270—272 页。

④ 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69 页。

⑤ 郑观应:《边防六(甲午后续)》,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 575 页。

⑥ 郑观应:《边防七(甲午后续)》,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 583 页。

⑦ 夏东元主编《郑观应年谱长编》,第 242 页。

⑧ 郑观应:《公法》,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 165 页。

⑨ 郑观应:《边防二》,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 550 页。

⑩ 郑观应:《边防二》,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 551 页。

国的进一步侵略行为会威胁德国的在华利益。因此,郑观应在《边防二》中主张“我中国欲仿远交近攻之法,宜速结英、德、美以拒俄、日”。^①甲午战争前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郑观应摒弃两次鸦片战争的历史伤痛,提出联合英国对抗日本和俄国的均势思想。一方面,郑观应的主张体现其现实主义思想。国际政治的核心是国家利益,而生存是国家利益的核心,也就是说谋求国家生存优于过往历史和意识形态。相较于日本和俄国,郑观应认为英国会因担心既有利益被侵犯而的侵略性较小,因此提出联盟主张。另一方面,中国与过往侵略国的联盟是其寻求自我保存下的无奈之举。郑观应重视自强,但甲午战争的结果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并且此时中国已经处于被英、德、法等帝国主义瓜分的边缘,中国急需寻求权力平衡之道,郑观应据此明确提出联日联俄主张:“中、俄、日可世为婚姻之国,合力以驱逐英、法、荷”,^②“中国宜开诚布公,勿念前仇,亦与日合,以践兴亚会之约,庶不为西半球各国所侵害也”。^③

庚子事变后,面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绝境,郑观应重提其联日观点,“为中国计,亟宜变法自强,结日联英以拒俄法”,^④“中、英、日合,非但朝鲜及中国边省可固,即日本与英之属土亦固,东方太平之局不难保矣”,^⑤当时的国际局势促使郑观应寄希望于日本从大局观出发思考中日未来。

又如,郑观应呼吁“为今变计,莫若联俄以制英……中、俄之势联,而后日人乃不敢肆其陵侮,英、法亦不敢行其覬觎”,^⑥“结英、日以拒俄,如日有异心则结英、德以拒俄、日,如法有异心则合英、德、美以拒俄、法、日,以期保护东方商务,彼此均有裨益”^⑦等等,可以看出,郑观应强调并重视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关系,在各国之间寻求“合从、连横”。^⑧

除此之外,作为一位善于交际的绅商,郑观应在政界、商界、学界、中外等都有着广泛的交流网络,使其得到许多日本侵略信息,郑观应多次向盛宣怀报告,其中不少体现了郑氏的均势思想。

甲午战争前后,郑观应多次就日本军事动作电联盛宣怀,“日本已有兵一千五百名围困朝鲜京城,有兵四千据守仁川,恐我国之兵不易前进”。^⑨“恐其不依公法,或乘时击我师船,阻我运兵上岸”。郑观应向盛宣怀提出联英抗日之建议,认为“未宣战遽伤英船,想英使必与之理论也”。^⑩在此之后,郑观应提出提防奸细、不买日本商品、禁止日本人用中国电报局等《管见十条》来抵抗日本侵略。^⑪同时针对社会盛传日本之兵舰较中国多强,郑观应在调研后发现“有兵四五十万之多者,皆虚声恫喝之词”,^⑫认为日本军舰与中国相差无几、兵力则不如中国,这使得原本低迷的士气得以提升。1894年大连、旅顺失陷,同李鸿章等不同,郑观应坚决反对投降,以“战、守、备”三策应对。其中,“备”指的是在封河之际尽快订购外洋之快船、枪炮和弹药,并抓紧实战演习,“以为明春大战复仇张本”。^⑬翌年,日本侵略威海之时,郑观应致书盛宣怀“仿西法创办民团,以保护苏松沿海一带地方”,^⑭认为民团可以提升兵力以增加均势之可能性。

甲午战后,取得巨大战争利益的日本对中国暂时采取温和手段,以伊藤博文为代表的政客表现

① 参见郑观应:《边防二》,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553页。

② 郑观应:《边防六》,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572页。

③ 郑观应:《边防六》,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573页。

④ 郑观应:《边防二》,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551页。

⑤ 郑观应:《边防二》,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553页。

⑥ 郑观应:《边防六》,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572页。

⑦ 郑观应:《边防二》,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555页。

⑧ 郑观应:《边防六》,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第575页。

⑨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日,夏东元编著《郑观应年谱长编》,第379—380页。

⑩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夏东元编著《盛宣怀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5页。

⑪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年八月,夏东元编著《郑观应年谱长编》,第385页。

⑫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附条,光绪二十年八月二日,《郑观应年谱长编》,第384页。

⑬ 《郑官应条陈战事》,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盛宣怀)收到,夏东元编著《郑观应年谱长编》,第392页。

⑭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夏东元编著《郑观应年谱长编》,第396页。

出支持中国维新变法的态度,获得众多朝野人物的好感,光绪帝、张荫桓、张之洞、刘坤一、陈宝箴、蔡钧、康有为、谭嗣同、杨深秀、唐才常等人表现出亲日甚至联日的倾向。李鸿章出访后制定的清朝“联俄拒日”的外交方针,已经动荡崩析。^①黄遵宪在甲午战争后就寄希望于中日友好,认为中日同在亚洲,唇亡齿寒,应共同抵抗西方侵略。康有为亦一厢情愿地说:“考日本昔为英、美所凌,其弱与我同,今何以能取我台湾,灭琉球而制朝鲜,得我偿款二万万?”^②

综上所述,列强对中国的无理侵犯证明国际公法的无力,这使得郑观应等产生和提倡均势思想。郑观应的均势思想是以国家权力为依托,并在提倡均势思想的同时更加注重增加国家权力,认为较强的国家权力才能确保公正。与此同时,郑观应的均势思想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其主张联盟的对象随着国际局势的走势发生改变,但在此过程中处处体现其追求国家安全和权力的核心特征。此外,郑观应主张根据国家现有及未来的国家利益决定联盟对象,利益相同则联盟,利益相背则对抗,这也凸显了均势的偶然性和不稳定性,即均势是通过不断地转换联盟关系来实现权力的平衡。

结 语

郑观应以自强、权力和均势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意识和思想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及历史渊源,他通过一些维新变法理论思考与具体实践,形成了以富国强兵为核心的维新变法思想体系,而现实主义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郑观应的现实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自强、权力和均势等维度,从当时中国的弱势出发,通过对现实的剖释强调了这三个维度的重要性,并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体现了郑观应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邃思考,也反映出他厚重的爱国情怀。

作为晚清时期维新思想理论建构与传播的旗帜人物,郑观应的维新变法思想,尤其是他以自强、权力、均势等为核心的现实主义思想,在晚清对政、商、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代表作《盛世危言》不但启蒙了那个时代,还为后世提供了思想启迪。面对困局,郑观应为以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为代表的清廷洋务派重要官僚群体提供了许多高质量的改革和决策建议、意见,其中相当部分的真知灼见还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改革发展举措。不仅如此,作为晚清许多重要洋务企业的直接管理者和经营者,郑观应还将一些自己的改革设想直接付诸于企业具体实践,体现出了较强的实践性、可持续性和应用性,为中国近代化和挽救民族危亡作出了积极贡献。

然而,郑观应现实主义思想的论述着重在介绍和论证思想以及具体实践上,但未将其真正置于现代国际体系中进行进一步剖析,致使其该方面思想缺乏深度,与现实仍有不小的差距。此外,郑观应对现实主义的认识还主要停留在中国这一个主体上,未对现实主义进行纲领性、普遍性的陈述,也未进行概念化。最后,郑观应的均势思想,无论是联英、联俄、联日,或是与其他国家联盟,在列强环伺的背景下,都不可能取得预想中的效果,他的均势思想即便实施也不可能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真正支持,注定无法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郑观应均势观念的时代局限性和思想局限性。当然,作为近代旗帜性的维新思想家,郑观应在中国近代的商界、政界和学术界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符合当时时代需求的现实主义思想仍是领先于那个时代并能够给人以启迪的。

(责任编辑:杜 倩)

①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67—468页。

②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0页。

History of Tubo (Tibetan) Kingdom and Textual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Divination and Historical Records: A Study of No. ITJ 739 of Dunhuang Manuscript

REN Xiaobo

The present paper, thoroughly studying the no. ITJ 739 of Dunhuang Manuscript, a handbook of divination through dice that was produced around the tenth century, argues that this handbook was affected by the art of divination and the traditional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embodied the superposition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which the Tubo Kingdom's unificatio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was displayed in conformity with the Tibetan tradition of Shamanistic historiography.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Production of "The Life of Muhuali" in *Yuanshi*

DONG Ruyang

The present paper, arguing against the general idea that "The Life of Muhuali (Muqali)" in *Yuanshi* (History of Yuan) wa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known as *Dongpingwang shija* (The Hereditary House of Lord Dongping), points out that this piece of writing was actually based on the *shilu*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founding emperor of Yuan, and its production revealed that Yuan's imperial historians repeatedly applied the same primary sources to different memoirs and records.

The Allocation of Sichuan Rice and Development of Chongqing's Rice Trade during Yongzheng and Qianlong Reigns

CHEN Pengfei

The present paper, analyzing the reason why the Qing government broke the local ban and allocated Sichuan rice to other provinces on a large scale since the Yongzheng reign, concludes that Qing increasingly resorted to the market mechanism in allocating Sichuan rice to provinces known for the lack of grain, and this effort cleared the decks for the flood of Sichuan rice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se River and made Chongqing the hub of rice trade.

Rethink: Interactions of Weng Tongshu, Yuan Jiasan, and the Xiang Army in the Battle of Anqing, 1859 – 1861

ZHANG Yihe

The present paper, reexamining in detail the interactions involving Weng Tongshu, the Governor of Anhui, Yuan Jiasan, the imperial envoy supervising military affairs of Anhui, and the Xiang Army, the key force fighting against the Taiping Army, during the Battle of Anqing, suggests researchers comprehensively observe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Xiang Army and the local power of Anhui so as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game between the political faction of Hunan and the imperial court.

The Realistic Dimension of Thought of Zheng Guanying

LI Zhengyang

The present paper, researching into Zheng Guanying's (1842 – 1921) long, deep, and systematic rumination over significant issues, such as Sino-foreign relations and reform,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Zheng developed his own realism since the late 1860s and that the Zheng-style realism was rational thinking underscoring *zhiqiang* (self-strengthening), which advised China to protect herself by developing education, promoting reforms, and maintain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in face of crises.

Classics and History: A Study of Dual Attestation Suggested by Wang Guowei

XU Chaojie

The present paper, disagreeing with the popular idea that Wang Guowei's dual attestation should be traced